

重磅推出

书界动态

这本书最早向世界介绍了长征

——关于陈云同志《随军西行见闻录》

核心提示

近日,上海《劳动报》报道:8集微纪录片《上海记忆:他们在这里改变中国》在沪首映,纪录片公布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中包括历史上第一部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亲历记《随军西行见闻录》。

这本红色出版物的发现始末、文物价值、多种版本流传和珍藏情况以及手抄本被发现的新闻报道,再次唤起人们对长征的记忆。



陈云(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1 第一版在苏联出版

1934年10月,陈云随红五军团一起长征。1935年6月上旬,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共中央秘密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7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及在上海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前往苏联。在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并于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署名“廉臣”。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莫斯科出版

单行本后,很快传到国内,先后以不同的版本出版印行,现发现的有: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从东南到西北》、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3月出版的《随军西行记》、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出版的《长征两面写》、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年6月出版的《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随军西行见闻录》连载版和单行本,现收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作者“廉臣”是谁?起初并不为人所知。直到198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重新刊登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才明确指出“廉臣”就是陈云。

4 借用苏州评弹手法

《随军西行见闻录》详细记载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时8个月、途经6个省、行程6000公里的传奇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逸闻史实。该书重点描述了红军艰苦卓绝斗争的英勇事迹,宣传了遵义会议精神,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爱护人民、关心少数民族的生动事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倡议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

陈云从小受到苏州评弹说书艺术的熏陶,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将这种表现手法融入对长征中惊心动魄的故事、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的描绘之中。

书中这样描写红军领袖的形象:“赤军中最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彭及党中央局等赤区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虽是简洁的白描,但非常细腻,既有对毛泽东、朱德形象的真切感知,也渗透着作者对领袖的敬仰之情。书中描写领导人与红军战士平等相处、同甘共苦,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故事细节,也颇为感人。

《随军西行见闻录》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在报告文学写作方面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也是独树一帜的。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大文出版社出版的《长征两面写》



明月出版社出版的《从东南到西北》



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的《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

2 最早介绍红军长征

在国内外出版的描写长征的图书中,人们往往把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当做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也有人说红军主要领导人王稼祥,于1936年初在苏联治伤期间,最早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情况。

但有关长征图书文化的研究学者认为:从出版时间上看,《随军西行见闻录》是党内最早向外界介绍长征的一本书。

1936年6月间,斯诺到陕北采访,收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他写

作的《西行漫记》英文版首次在英国出版,时间是1937年10月;而王稼祥在苏治伤时间也是在1937年。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写于1935年8月,1936年3月开始连载发表,7月结束出版发行,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1年多;比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的被看做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神灵之手》,还要早近半年。由此可以说,陈云堪称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随军西行见闻录》为后人研究红军长征保存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3 采取第三者视角

陈云同志是长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对于长征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众多参与者,应该怎样真实具体生动地表现?这部书的写作,是进行了精巧构思的。

初版《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何署名“廉臣”?陈云曾这样解释:“这篇纪实文章,为了便于在国统区流传,笔者只好在文中装作一个原在国民党军队中,后来又因被俘在红军中工作的医生,我在论述红军之长征时,采用的是第三者的语气。”陈云巧妙地运用了假托的艺术笔法,以当时闽西一个个体医

生傅连璋在长征中的经历为原型,假借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之口,详细生动地讲述了红军长征。

采用这样一个叙述角度,一是故事的叙述者可以站在一个观察全局的位置,聚焦所观察描写对象的各个侧面,尤其是从上层看到红军长征全局的一些情况;二是可以从中立的立场反映红军长征历史活动。这种叙述方式,叙述者和他的故事、事件与时间,是统一融合的。这样的叙述观察角度,对红军将士的生活、军事策略、战斗精神的认识和表现,会更加客观真实。

《校园记忆》新书发布会举行



昨日,由张文欣主编的《校园记忆——“新三届”和“老三届”的故事》新书发布会暨座谈会在洛阳师范学院新校区举行,以纪念该校百年校庆。

“书里的故事是对那一段特殊岁月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录,其中也包含了我们很多感慨和激励……”座谈会上,毕业生代表们以“喜迎百年校庆 共话校园记忆”为主题,共同回忆了那段校园时光,并向母校捐赠了新书。洛阳师范学院原院长、著名学者叶鹏等教师代表,也寄语毕业生们“要把‘人’字写端正,你们都做到了”。

洛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明德表示,以学院1977、1978、1979级毕业生们为主完成的《校园记忆》一书,从策划、征稿、集稿到编辑出版,历时5年。该书辑录了数十篇散文,毕业生们以特殊、真实的情感和笔触,回忆了学习生涯及当时学校和社会发展的“剪影”,是一笔值得珍藏并传递下去的精神财富,对于今日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也是一本可资借鉴的好素材。

(李梦龙)

连载



突出重围(五)

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叽里咕嘟,说的是周仁杰听不不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

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顿时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做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有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的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枪声居然来自镇中!镇子里传出的枪声令红军惊异万分,他们用手桌子当掩体,一边没有目标地四处射击,一边急速地向镇外撤退。

查阅现在所能查到的史料,也无法查清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在九时至十二时之间的三个小时内,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指挥员面对突发敌情为什么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唯一能够说得通的推测是,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判断成企图骚扰他们的小规模的敌方武装。在这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内,他们既没有下达展开部队以抢占有利地形的命令,也没有部署遭到袭击之后部队的作战方案。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桂军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除了周仁杰的先头营,整个第六军团从军团指挥员到普通官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桂军在这三个小时内占领了甘溪镇北面 and 东面的制高点——群宝山和白虎山,迫击炮阵地设置完毕,机枪扫清了射界,桂军那些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步兵在布满山脊脊线的低矮丛林中时隐时现,使山脊两面的山岭如在风中起伏涌动。其中,一个营规模的桂军正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分两路向甘溪镇的左右两翼迂回,远远地看过去像是两道混浊的泥水正沿着河道蠕动而来。而另一股桂军——其头头的定是个富有作战经验和冒险性格的老兵——钻进了一条用厚木板封住顶部的暗水沟,这条暗水沟自镇北的小河一直通到镇中。十二时响起的枪声就是他们突然掀开头顶上的木板射出的。

读家之言

“四大名著”不适合孩子阅读吗?

□ 琦中林

9月26日,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四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吗?》,认为四大名著及部分国外经典不适合孩子看,引发网友热议。

秦院长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其认为孩子心智不成熟,无法充分理解书中错综复杂的价值观,他解释:“《水浒传》里满是打家劫舍,落草为寇,占山为王。《三国演义》中充斥阴谋诡计,权术心机,尔虞我诈。《西游记》根本上讲述的是佛法的人生,远非孩子所能理解。《红楼梦》‘色、空、幻、灭’的主题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这种想法相当有市场。初学汉字的孩子并无足够能力阅读这些著作,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更容易望文生义地附会、误解。不少家长往往抱着聊胜于无的心态鼓励孩子阅读经典,殊不知在难以卒读的状态下,推拒助长只

会滋生儿童的厌学情绪,从而事与愿违。现实中许多类似案例,秦院长从教育角度进行了一番思考,这也是问题看似“老套”却备受关注的原由所在。

然而,过分强调阅读必须与人的心智发展程度相匹配,也容易通入误区。阅读的目的,在于传递新知,为读者开辟新世界。我们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知识需求,阅读与自身发展程度相匹配的著作有其必要,但这不是阅读的主要功能,阅读要求读者不满足于现状,它理应为打开精神束缚的钥匙,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学者、家长鼓吹令其成为枷锁,这就与阅读的启蒙功能背道而驰了。如同面对那些对成人世界充满好奇的儿童一样,我们要做的不是竭尽所能地让成人世界继续保持神秘,而是要以儿童能接受的方式为他们逐步揭开成人世界的面纱,从而消除他们的偏执与恐惧。

将名著硬生生划分为“成人的”和“孩子的”既不符合实际,也低估了孩子的理解能力。教导为人处世的道理不是名著所应承担的唯一责任,同样是《三国演义》,在成年人看来不过充斥着阴谋诡计,孩子却更容易为其中一个个生趣盎然的故事所吸引。“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带给孩子的不是敷衍之术,而是故事波澜曲折的趣味。不少学者担心《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等情节会令孩子变得叛逆,却不知儿童本就对背后的各种世界观不感兴趣,他们喜欢的是“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可大可小的如意金箍棒、八卦炉中炼出的火眼金睛、扇灭火焰山的芭蕉扇等。孩子与成年人的差别决定了他们在阅读时会各取所需,认为带“成人色彩”的名著将败坏孩子的道德只是想当然的推断,这一推断恰恰反映了部分学者和家长对孩子个性缺乏尊重。阅读是一桩乐事,孩子必须有选择读物的自

主权,希望通过制定一份“无害”的读书目录从而让孩子在限定框架内成长,这种做法不啻将名著贬低为行为守则,抹杀了名著的真正价值。孩子能够阅读名著,也必须通过阅读名著来汲取人生智慧,名著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能培养起他们卓尔不群的品格。

在不具备基本理解能力的前提下贸然阅读名著,自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可只要孩子有兴趣就应该鼓励他们自由阅读。宋代的程颢曾说:“读书要玩味。”涉世未深的孩子最初可能对书籍内容存有误解,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们便会自觉返归书籍,完善认识,更新体验,名著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他们洞察、体悟人生的媒介,这种阅读体验绝不是普通书籍所能满足的。名著并无“孩子”“成人”之别,名著恰恰是沟通孩子与成人世界的桥梁。

(据人民网)